学术专论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尤淑君

【摘要】 1890 年 6 月 4 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吊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关键词】 君臣名分　自主　袁世凯　赐奠　郊迎礼
【中图分类号】 K3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4）－04－0039－11

一、前言

明清中国管理属邦的模式是“属邦自主”，中国不随意干预属邦内政、外交，只要求属邦按期朝贡，藉“礼法”羁縻属邦，即可相安无事。对此，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与属藩的往来，取决于等级制的名分秩序，朝贡贸易的经济效应及儒家文化的思想传播。①诚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人所言，中韩宗藩关系看似松弛，却可延续五百多年之久，其中有许多《国际法》无法解释的约束力。如全海宗指出中朝宗藩体制的维持不在于朝贡贸易的利益，也不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而是出于朝鲜统治阶层维护政治权力的考量。②曹雯指出，中朝关系在诸藩封国中最为密切，堪为清朝藩封体制下的典范，而宗藩关系的基点在清朝皇帝掌握了朝鲜国王的册封权。③宋惠娟也指出，宗藩关系持久存续的原因在于中国“抚藩字小”的道德外交，而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维持的根本原因，实为政治上的需求，并将“以小事大”作为朝鲜的保国之道。④由此可知，中朝宗藩体制长久维持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允许朝鲜“属邦自主”，不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使朝鲜的统治阶层得享受政治利益，却不需担心大权旁落。

【收稿日期】 2014－02－09
【作者简介】 尤淑君（1979－），女，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杭州 310028；0011142@zju.edu.cn

①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② 【美】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 103—104 页。
③ 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38 页。
④ 宋惠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20 页。

清政府虽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朝两国之间的交往却有特定的仪式，用以体现“事大之礼”与“字小之义”。① 当朝鲜开国、陆续与欧美国家缔结商约后，清政府的朝鲜政策转向积极，逐渐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朝鲜事奉中国的态度已不如以前般恭谨，屡思自主，挣脱清政府的控制，遂有计划地破坏宗主国的权威，② 让中朝宗藩体制产生质变，甚至埋下了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为了强化宗藩体制，清政府坚持朝鲜君臣履行“事大之礼”，并在《中朝水陆通商章程》里制订许多仪式上的等差位阶，让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得以凌驾各国驻朝鲜公使之上，引起公使们的不满与质疑。③ 若按照《国际法》的定义，朝鲜政教自主，便是自主之国，不作为中国的属邦。④ 因此，日本、欧美各国纷纷质疑袁世凯（1859－1916）的特殊待遇，并指出朝鲜既与各国缔约通商，表示朝鲜在内政外交上有自主权，这样朝鲜就是独立国家，而不是清政府的属邦，其往来亦不能有等差礼仪。⑤ 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强调中朝往来的等差礼仪，突显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也向日本与欧美各国表示朝鲜为清政府的属邦。

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从“属国自主”为切入点，重新观察清政府、朝鲜、英美国家对宗藩关系的认识，并动态地分析中、朝、美、英等国各自对“属国”、“自主”、“属国自主”的解释、立场其及应对方式，说明中朝关系的演进过程不只是单方面的施与受，而是包含西方国家与外国顾问等多方力量的角力。⑥ 权赫秀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朝鲜外交是“两截体制”，与晚清中国外交一样是“一个外交两种体制”，⑦ 所以中朝两国之间产生了许多与宗藩体制有关的礼仪之争。对此，林明德认为，“壬午事变”是中朝宗藩关系的转捩点，此后中国的朝鲜政策转为积极，双方的交往仪式也有了实质上的变异。⑧ 张启雄也指出，传统中韩间原本是“无为而治”的宗藩关系，但因列强觊觎朝鲜，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无法沿用传统的无为政策，不得不改采监国干涉政策。⑨ 袁世凯过度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结果，让朝鲜亟欲脱离清政府，也让清政府与各国驻朝公使屡生龃龉。⑩

本文以中朝两国如何处置赵太妃（1808－1890）的丧礼为切入点，讨论清政府与袁世凯坚持事大礼仪的原因及其妥协之处，再观察朝鲜王室如何阻碍清政府遣使赐奠的种种活动，最后验

---

①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第137页。中朝宗藩关系以奉正朔、奉表、朝贡、册封、敕使、贡使及万寿、千秋、冬至、元旦等节日庆贺使的派遣，作为象征。其他的谢恩使、陈奏使、奏请使、陈慰使、进香使、赐奠使等也作为惯例举行。

② ［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韩］宋炳基《一八八二年朝美条约的订立与清代中国》，杨秀芝译，乐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21页。

③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38—140页；宋慧娟、李晓光《简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对中朝关系的影响》，《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④ ［美］惠顿《万国公法》卷2《第三章论诸国平行之权》，丁韪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⑤ 权赫秀《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6年第1期。

⑥ ［日］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⑦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权赫秀《两截体制与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以首任天津驻扎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活动为中心》，韩国《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2007年6月第51辑，第5—47页。

⑧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37—138页。

⑨ 张啟雄《国際秩序原理の葛籐—中韓宗藩關係をめぐる袁世凱の名分秩序觀》，［日］山室信一编《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年，第39—58页。

⑩ 坂野正高指出，袁世凯的职位英译为Resident，即中国对朝贡国或属邦的朝鲜掌统其外交实权，如同清朝派驻的监国大臣，其用意在强化中韩宗藩间的名分。［日］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陈鹏仁、刘崇棱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20页。

证清政府用“名分秩序”压制朝鲜的作法，是否能让朝鲜接受宗藩体制的君臣之分，而各国驻朝公使又如何看待朝鲜君臣迎接敕使的行为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正当性基础。

二、赵太妃之薨与清廷赐奠

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1890.6.4），朝鲜神贞王后赵氏（1808－1890）逝世，享年八十三。赵氏历事四朝，是朝鲜翼宗（孝明世子李旲，宪宗追封为翼宗、高宗追封为文祖）之妻，宪宗之母，哲宗之嗣母，被尊称为大王大妃。① 哲宗死后无子，赵太妃以大长辈身分，选定李昰应（1820－1898）之子李熙（1852－1919）入嗣翼宗，为朝鲜高宗。② 李熙即位之初，赵太妃以嗣母身分，垂帘辅政，子侄赵成夏（1845－1881）、赵宁夏（1845－1884）等人掌握大权，丰壤赵氏的势力达到顶峰。大院君李昰应韬光养晦，暗中培养实力，最后利用三年除丧、国王大婚的机会，协助李熙亲政，逼迫赵太妃交还政权，丰壤赵氏也随即失势。赵太妃虽被大院君逼退，但尚未丧失力量，暗中与被大院君打压的骊兴闵氏及安东金氏联手，吸收不满大院君的两班贵族，最后支持朝鲜王妃闵氏（1851－1895），逼退了大院君。③ 可以说，赵太妃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影响朝鲜的权力结构，尤其在1882年的“壬午军乱”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赵太妃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不但集结两班贵族，稳定国内秩序，并主动联络中国，请求出兵，利用中国的力量，制衡大院君或闵妃的势力。可以说，赵太妃是朝鲜宫廷的大长辈，也是朝鲜的事大派领袖，更是清政府用以制衡朝鲜国王的支持者。

赵太妃薨逝后，朝鲜随即知照商务委员袁世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按照《大清会典》与《礼部则例》的规定，属藩的国王、王妃薨逝，必须派遣告讣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清政府派出正副使各一人，前往赐祭，并赐谥号，以正名分。④ 因此，以赵太妃之薨为契机，清政府依照宗藩体制的成例，主张行“弔赙礼”，将派出敕使，前往朝鲜赐祭，抬高赵太妃的地位，并拉拢朝鲜国内的事大派，重导朝鲜内部的权力结构，向各国展现宗藩体制的有效性。可是，朝鲜政府却以“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为藉口，向袁世凯表示取消“大丧礼”的想法，又迟迟不回覆是否派遣告讣使之事，不愿让清政府派出敕使弔丧，这样朝鲜国王就没必要出迎敕使，然后逐步地摆脱清政府的控制，厘清西洋国家对朝鲜是“半主之国”的质疑。同时，为了防止大院君可能以护丧为由，发动政变，朝鲜国王暗中向美国驻朝公使赫兑（Heard）求援，希望美国军舰能派出50名水兵入宫护卫，保证宫廷的安全，⑤ 并不顾袁世凯的反对，准备留用美籍顾问德尼（O. N. Denny），主导朝鲜外交事务，让德尼引美国之力，降低袁世凯在朝鲜的影响力，让清政府打消派遣敕使的想法。⑥

另一方面，商务委员袁世凯想藉由“赐奠”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证明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遂向朝鲜政府施压，一再催促，并强调“名分秩序论”，指出朝鲜国王李熙已入继翼宗，在

---

①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卷27，国史编纂委员会，1981年，第51a—55页b，高宗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从神贞王后赵氏的行状来看，可见神贞王后历经四朝，地位稳固，等于是朝鲜宫廷的大长辈，其地位、人脉及影响力不可小觑。此外，中国也规定朝鲜国王未获册封诏书前，呈奏中国的奏疏多由大妃及议政府具名，或国王以“朝鲜权署国事”出奏。

②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卷1，第4页a，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③ ［韩］郑乔《大韩季年史》卷1，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第8页；［韩］李萱根《韩国近代史》，中华丛书编审会，1967年，林秋山译，第1—9页。

④ 周家禄《奥簃朝鲜三种》卷2，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8—49页。

⑤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3821—3822页，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戌刻寄朝鲜袁道；第3822页，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刻寄译署。

⑥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2页，光绪十六年二十七日辰刻寄译署。

名分上即赵太妃嗣子，必须为赵太妃举行“大丧礼”，符合宗法礼制的母子名分。更重要的是，朝鲜必须遵行事大礼仪，遣使告讣，再由礼部派使赐奠，方符合宗藩体制的君臣名分。同时，对美使赫兑询问各国驻朝公使如何公弔之事，袁世凯拒绝了与公使们一同讨论的提议，并指出中国为朝鲜上国，将派遣敕使前来弔赙，与各国体制情形大相悬殊，而商务委员与朝鲜国王皆为皇帝臣属，商务公署不便与公使团举行公弔，只能照中国品官交情仪节，为朝鲜国王设宴叩奠。① 此外，对朝鲜国王请美军入宫护卫之事，袁世凯以“有损属邦体制”为由，反对朝鲜借用美国水兵，并请总理衙门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不要插手朝鲜事务，并询问美国是否同意赫兑调派水兵，要求斥责赫兑，避免日后再生事端。② 而朝鲜官员和将官同样反对向美使赫兑调兵，劝诫国王不要养狼驱虎。面对国务院的斥责，赫兑只好撤回水兵，不敢过度卷入朝鲜内政，避免清政府再次照会抗议。③

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朝鲜派出承旨洪钟永为告讣使，校理赵秉圣为书状官，携带表文及递礼部咨文，于五月二十四日赴京告丧。④ 除了告讣之外，洪钟永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即请求清政府免除赐奠，其呈递礼部的咨文内容：先感谢清廷再造之恩，代为平定壬午、甲申年的内乱，再向清朝官员诉说朝鲜国弱民穷、近来饥荒，无力支付“大丧礼”的费用，恳请皇帝能逾格施恩，体谅朝鲜的难处，一切从简，免去遣使赐奠之举。⑤ 朝鲜国王亦命令朝鲜驻津商务委员，向北洋大臣请求，希望能按照过去的“顺付之例”，让告讣使洪钟永回国时，顺道带回“赐谥”诏书，这样清政府就不用特派敕使弔唁，否则各国皆援例派使，朝鲜将无力供应。⑥ 对朝鲜的这些小动作，李鸿章认为朝鲜别有用心，只是表面事奉中国，暗地却援引外国势力，挟制朝廷，令清政府投鼠忌器、不敢派使弔唁。而袁世凯则指出，赵太妃身为韩王嗣母，历事四朝，倾心慕华。中国必须派使祭葬，既可彰显宗藩关系，消除外国的觊觎之心，又可抚慰“事大派”的朝鲜官员，拉拢人心，才是符合君臣礼义的作法。⑦

根据袁世凯的电报内容，清政府认定朝鲜请求“顺付”，不愿举行大丧礼，乃意图挟制，欺朦中国，⑧ 故没有接受洪钟永的请求，并指出“赐奠”是天朝抚恤属邦的恩典，涉及宗藩体制，岂可轻易更改。⑨ 但考虑到朝鲜国用匮乏，恩准变通旧制，指定弔祭使不由陆路行走，改走海路乘船，径至朝鲜仁川登岸，路途甚近，支应无多，可节省沿途供应使节团的费用。清政府更特别强调，弔祭使抵达朝鲜后，一切礼仪应遵照旧章，不得稍有简略。⑩ 若朝鲜国王按照往例、馈赠银货，正副使和通事皆不准收受，以示体恤属藩之意。由此可见，对赵太妃的丧礼安排，朝鲜一

---

①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研院近史所，1972 年，第 1538 号，第 2785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②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22 页，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亥刻寄译署。

③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1549—6 号，第 2806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附件六：总署发驻美参赞电；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23 页，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辰刻寄译署。

④ 袁世凯 《使韩纪略》（未刊稿），第 2 页，收入 *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总页 46。

⑤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1563—1 号，第 2826 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附件一朝鲜告讣使洪钟永呈文。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1，文海出版社，1970 年，第 762 号，第 43 页 a，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礼部奉朝鲜告讣使臣呈请免遣使赐奠折。

⑥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23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巳刻寄朝鲜袁道。

⑦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23—3824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巳刻袁道来电。

⑧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24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午刻袁道来电。

⑨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1564 号，第 2827 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总署收军机处钞交出上谕；袁世凯 《使韩纪略》，第 5 页，*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总页 47。

⑩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1，第 764 号，第 43b—44 页 a，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礼部等上谕。

开始就不愿意按宗藩成例举行，而清政府根据“名分秩序论”，坚持遣使赐奠，藉着礼仪表现上的等差位阶，强调君臣名分，进一步强化宗主权，向西洋各国彰明宗藩体制。尤其在朝鲜国王是否赴城郊、迎敕使的“郊迎礼”问题上，一旦敕使到来，朝鲜君臣必须出城迎接，甚至向皇帝诏书行跪拜礼，将证明朝鲜国王确实是中国皇帝的臣属，打消朝鲜追求自主的念头，① 更可看出中朝双方坚持的礼仪底线，也可观察各国驻朝公使对中朝宗藩体制的看法，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

三、郊迎礼与朝鲜的抗拒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凡有清朝敕使到来，朝鲜必须选出远接使、问礼官、差备官，迎接敕使，义州、定州等六处郡守也得派出迎慰使，在沿途驿站伺迎，而朝鲜王室、礼曹、政院、内侍府还会派遣问安使，前往开城、平壤、义州三处，向敕使问安。② 等敕使队伍到汉城郊区，国王必须亲自出郊迎接，在城外的迎恩门（朝鲜国王亲迎敕使处）等待，王室宗亲、文武百官东西序立，众人鞠躬祇迎，伴送至慕华馆，称为“郊迎礼”。③ 光绪皇帝选定由户部左侍郎续昌（1838－1892，蒙古正白旗）、右侍郎崇礼（1834－1907，汉军正白旗），作为弔祭赵太妃的正副使。④ 九月十七日（10．30），续昌、崇礼两人领着百余名随员，从北京启程，由天津乘坐北洋轮船，并通饬各海口一体接护，提调北洋海军济远、来远、经远兵船护送，至朝鲜仁川登岸。北洋海军各管带需约束官兵，不准登岸滋事。未赴朝鲜之前，续昌等人强调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令朝鲜不得轻改事大礼仪，并知会袁世凯先行通告各国驻朝公使团：此次弔祭乃中韩自办之事，不宜接见各国驻朝使节，庶全宗藩体制。⑤

朝鲜见清政府态度坚决，只得暂时接受，随后透过朝鲜驻津商务委员向总理衙门恳请“改道”，表示仁川到汉城距离八十里，但沿途只有一小站，极为凋残，备供不足，希望敕使队伍能改由距离汉城一百里的马山浦口登岸，较易置办物资、供应食宿。⑥ 对此，袁世凯立刻向总理衙门表示，朝鲜提出的“改道”方案，实有蹊跷。因为仁川至汉城有大、小二路，大路九十里，乃经富平至汉城，道路平坦，电报可通，甚为方便。相反的，马山经南阳、水原至汉城约一百六十里，道路险窄，联络不便，如何能供应食宿？袁世凯认为，朝鲜之所以要求改道，诿称仁川至汉城沿途不便，乃因敕使若在仁川登岸，远迎使等人必须到仁川行礼迎接，但因各国租界设在仁川，自然不少外国商民，⑦ 朝鲜不愿让外国人见到远迎使行入界仪式的样子，只好谎称仁川不便接待，阻止续昌等人在仁川登岸。⑧ 清政府听信袁世凯的意见，自然维持原案，令续昌等人由仁

---

①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4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午刻袁道来电。

② 昆冈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6，启文出版社，1963年，第724a—724页b。

③ ［韩］朴容大《增补文献备考》卷177《交聘考七》，古典刊行会出版，1958年隆熙二年版本，第5页b;［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敕使誊录》卷10，《各司誊录》第90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97年，第611—613页，英祖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第614页，英祖元年乙巳三月初四日。

④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第775号，第45b—46页a，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二日礼部奏请谕祭朝鲜国王母妃正副使折。按照《大清会典》载：谕祭朝鲜国王母妃，选派正副使各一员，正使须从内大臣、散秩大臣、头等侍卫中选用，副使须从满洲内阁学士、掌院学士、礼部侍郎之中选用人选，又查道光二十三年（1843）朝鲜国王妃薨逝的前例，正副使的选用资格改为满洲六部侍郎、八旗副都统。

⑤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第790号，第49页a，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发北洋大臣电。

⑥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30页，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巳刻寄译署交续崇两钦差。

⑦ ［韩］高秉云《近代朝鲜租界史の研究》，雄山阁出版，1987年，第119—126页。

⑧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第777号，第46a—46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北洋大臣来电；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30页，光绪十六年九月初六日酉刻寄译署。

川登岸。

朝鲜政府无奈之下，只好派遣刑曹判书南廷哲为馆伴官，内务府督办沈履泽为远接使，户曹判书闵泳商为提调官，大护军李裕永为伴送使，负责迎接敕使。① 按照旧例，钦使抵达韩界，必须派出远接、迎慰各使及地方官，在鸭绿江迎接敕使，举行宴享。但先前清政府答允变通，让正副使续昌、崇礼改走海路，无法援引旧例。因此，袁世凯主张，敕使既走海路，必由仁川登岸，自应以济物浦为韩界，在济物浦行入界各礼，避免朝鲜藉词诿误。② 对袁世凯的要求，朝鲜政府不敢推诿，先在仁川至汉城沿途，各驿站照例预备夫马，伺候敕使，且从济物浦至汉城慕华馆的途中，敕使队伍经过的道路、桥梁皆预先修整，垫上黄土，路平道宽，可供五马并行。此外，敕使过境的各邑，必须抽调官兵，负责抬仪杖、举旗帜，仁川府也出动洋枪队百人，以供护卫。可以说，朝鲜迎接敕使的规模，比拟朝鲜国王出巡仪制。

续昌等人抵达济物浦后，见朝鲜政府有意拖延，先宣称朝鲜国王若不行“郊迎礼”出迎敕使，将不进入汉城，③ 又特意让队伍行经仁川的华洋租界，其阵仗之大，吸引了不少各国官民围观。④ 礼曹原本安排的迎敕仪式，多根据朝鲜世宗时期的《迎敕书仪》⑤ 加以修订：迎敕仪式在景福宫正殿勤政殿举行，采用亲临郊迎之例。敕使虽改行水路，但郊迎之处所，仍按旧例，在崇礼门外举行。因弔勅之行属丧礼，不可设宴享，只行茶礼，城阙门只结彩、不鸣炮，以示哀戚。⑥ 朝鲜国王李熙有五次诣慕华馆、迎敕书的经验⑦，很快地答允礼曹列出的迎敕仪单。但朝鲜外署顾问德尼、李仙得（C. W. Le Gendre，1830－1899）皆出面阻止，力劝朝鲜国王应在宫候见，不可先迎谒敕使，⑧ 否则将失自主体面。德尼等人的建议，让朝鲜国王改变主意，欲托病不出。朝鲜诸臣却以“旧章须遵”为由，建议国王须遵事大礼仪，才能取得清政府的保护，让朝鲜国王多有顾忌，不敢遽然违制。⑨

朝鲜国王相当为难，游移在“事大”与“自主”之间，不知该采用礼曹的意见，或听从外交顾问德尼的看法。为了观察情况，朝鲜国王相当关切敕使的动向。朝鲜国王先与金弘集讨论续昌的为人，指出续昌“为人坚守古规，议论难合”，⑩ 且召见远接使时，命令仁川沿途的食宿问题，不应有窘乏的情况，更特别交代“外国人应接之道，极为难处。迎慰之时，善为备礼，可也”。⑪ 某些研究成果指出，朝鲜国王受到袁世凯的威逼，勉强出城迎敕，⑫ 但韩方资料却未见记载，却见到朝鲜国王对迎敕仪式多有反复，可见其矛盾处境。例如，根据惯例，国王命令王世

---

① 袁世凯《使韩纪略》，第11页，*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总页50。
②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9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辰刻寄译署。
③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第795号，第50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北洋大臣来电。
④ 袁世凯《使韩纪略》，第15、30—31页，*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总页52、60。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132《迎敕书仪》，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第31a—33页a。
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卷27，第56页b，高宗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
⑦〔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卷3，第69页a，高宗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卷12，第17页b，高宗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卷13，第10页b，高宗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卷15，第42页b，高宗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卷18，第25b—26页a，高宗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⑧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31页，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戌刻寄译署交续崇两钦差。
⑨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31页，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戌刻寄译署交续崇两钦差。
⑩〔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1972—1974年，第27页a，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⑪〔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第43页a，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⑫〔韩〕李萱根《韩国近代史》，第342—343页。

子随驾迎敕，但隔日又命王世子免去迎送。① 又例如国王出宫后，应先乘舆、后乘马，但以“国王患病”为由，改为先乘舆、后乘轿，宗亲及文武百官仍旧乘马。② 由此可知，这次的迎敕仪式与过去成例有些差异，而这些细微的仪式差异，即朝鲜君臣努力模糊等差位阶、摆脱宗藩体制的证明之一，故有必要说明国王迎敕的过程，并比较过去成例与本次仪式的差异及其礼秩意义。

九月二十六日（11.8），朝鲜国王乘舆出宫，经勤政门外降舆，乘轿入幄，行祇迎礼，四拜鞠躬，亲自迎敕书。礼毕，国王仍乘轿至敦义门，入光化门，至勤政门外降轿乘舆，归景福宫，在勤政殿召集宗亲、文武百官，接见敕使，行茶果礼。③ 祭文龙亭及赙物舁担，由景福宫正门入，使者从旁门入宫，国王东向鞠躬，礼毕平身，国王北向立，宗亲及文武百官皆同。龙亭升殿后，置祭文及赙物于案上。敕使宣敕，国王鞠躬四拜。随后，行赐祭礼。敕使捧祭文，前往魂殿（兴福殿），等待赐祭。司香二人进香案前跪，三上香，国王着丧服，行四拜礼。由左赞礼请去杖免绖，启请止哭，再接下祭文。敕使亦三上香，奠币祭酒，由国王跪读祭文，捧祭文官焚烬祭文及币，祭葬仪式正式结束。祭祀结束后，在斋殿设茶宴，香案设于北面，国王与敕使分就座东、西两侧，互行再拜礼。根据古礼“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④，但举行茶礼时，国王却东向立，敕使西向立，可见与过去举行茶礼的成例已有不同，⑤ 国王位尊于敕使。茶礼结束、敕使欲离去时，引礼官引导敕使由东阶降，承旨官引导国王由西阶降，敕使拱手作揖，国王答揖，送至勤政门止步。敕使一行返回慕华馆，宗亲及文武百官随行至慕华馆。朝鲜百官依品位顺序，对敕使行再拜礼，敕使答揖。最后举行下马宴仪，在慕华馆设茶宴，安排敕使座于东壁西向，国王座于西壁东向，⑥ 同样是国王位尊于敕使的座位安排。茶礼结束后，国王与敕使相揖而罢，出馆还宫。

上述四项的礼仪注单，皆经过敕使反覆查核，以“尚符向例”，批准照行。从仪式的细微差异，可见朝鲜政府仍保有其自主意志，巧妙地掩饰了君臣地位的差距。尤其在整个迎敕过程里，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王世子未出迎敕使。根据《迎敕书仪》规定：当国王出宫迎敕、诣慕华馆、乘舆还宫、敕书升殿、接待敕使等过程，朝鲜王世子必须侍随国王，立于宗亲、文武百官之前，率先鞠躬行礼，尤其当使者前往太平馆，举行宴享时，王世子必须随行至馆，与使者行顿首再拜礼。⑦ 但在举行大丧礼的五天前，国王不理睬惯例，命令王世子免去迎送，⑧ 且从大丧礼的整个过程来看，王世子没有参加路祭，⑨ 也没去迎接敕使，只是派出二品中使，带去王世子名帖

---

① ［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第53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第55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② ［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第70a—70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③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卷27，第59页a，高宗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29，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820页。

⑤ ［日］篠原啟方《朝鲜王朝の茶礼—明・清使への賓礼を中心に—》（《周縁のシリーズ1：東アジア茶飲文化と茶業》2011年3月第1期），第57—73页。

⑥ ［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第70a—70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使韩纪略》，第17—28页，*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总页53—59；［韩］国葬都监编《神贞王后国葬都监仪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档号305—82，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关于这次迎敕仪式可比对正祖二十三年迎敕仪注秩，［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敕使誊录》卷12，《各司誊录》第91册，第155—158页，正祖二十三年己未正月。

⑦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敕使誊录》卷11，第103页，英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第104页，英祖二十六年庚午十月初一日；第111—112页，英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⑧ ［韩］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卷363，第53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第55页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⑨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9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酉刻寄译署。

及礼物单，向敕使问安而已，并不像袁世凯回报的那样 “典礼悉遵旧制”。① 二是备迎处改在敦义门。朝鲜都城汉城，以坐北朝南的朝鲜王宫景福宫为中心，其四个正城门分别为兴仁门（东大门）、敦义门（西大门）、崇礼门（南大门）及肃靖门（北大门）。② 崇礼门向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城门，更是朝鲜都城的主门，朝鲜历代国王举行谒陵、设宴、饯别、移摹影帧等大典，多在崇礼门外举行。虽前代有敕使出、还宫经敦义门的例子，但多以 “道路拘忌” 为由，才选择由敦义门进出，皆属特例。③ 前文提及，朝鲜礼曹本依据往年惯例，将备迎处设在崇礼门。但奇怪的是，九月二十二日时，朝鲜又以 “崇礼门外道狭不便” 为由，④ 改在敦义门外迎敕，并将京畿道监司衙门前通衢，作为祗迎处所。

朝鲜擅改旧制的作法，引起续昌等人的不满，决定给朝鲜一个下马威。因此，当郊迎礼结束后，续昌等人须前往景福宫行赐祭礼，却突然由慕华馆往南折行，自崇礼门进入汉城。两使并轿双行，仪仗在前，兵队夹护，队伍所经之处皆拆去草棚违建，并以布帐遮蔽各街巷口，派兵把守，不准闲杂人等往来喧哗。最后，续昌等人直接由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入宫，直至勤政门才降舆。续昌等人不按牌理的行径，自然引起汉城居民和各国官商注意，围观人数竟高达十数万人。从续昌等人的突发举动，可知朝鲜改定敦义门的理由实有蹊跷。站在朝鲜政府的立场来看，若在崇礼门备迎的话，敕使行列就必须进入汉城市区，再绕往敦义门旁的慕华馆，势必被更多人注意。若是直接在敦义门外备迎敕使，便可将迎敕仪式限定在敦义门及附近的慕华馆，迎敕仪式的影响可缩减到最小范围，却不致于引起清政府的不满。但朝鲜的用意却遭续昌等人看破，因此续昌等人才会突然南折，刻意从崇礼门入汉城，并沿途拆屋扩路，派兵看守，欲高调宣传敕使的到来，让朝鲜政府行礼如仪，无法隐瞒中朝宗藩关系的有效性。

四、各国驻朝公使的反应

对赵太妃之薨及其丧礼仪式，各国公使未表异议，却相当关注，频频打探赵太妃出殡日期，意将迎谒国王，其中以美国公使赫兑的态度，最为积极。⑤ 四月十八日（6. 4），美国公使赫兑询问袁世凯，各国公使应如何弔丧赵太妃，希望袁世凯能和他国公使共同商议。袁世凯回绝了赫兑的邀约，特别指出 “按各友邦通使例，驻扎之国有国丧大典，率皆由驻扎使员前往公弔，无派专使弔赙事”，⑥ 并强调朝鲜为中国属邦，清政府将派遣专使，前来弔赙，与朝鲜往来仪制向有定制，与各国体制情形大相悬殊，商务委员与朝鲜国王皆为皇帝臣属，商务公署不便与公使团举行公弔，只能照品官交情仪节，为朝鲜国王设宴叩奠，因而商务委员无法出席使节团会议，亦不会参加各国使节的公弔。

后来，赫兑又对朝鲜政府表示，希望能在赵太妃出殡时，美国公使将在出殡途中，谒见朝鲜国王，并能参与送殡，与袁世凯一同由宫门外随送出城。赫兑欲道谒国王的请求，遭袁世凯以

---

①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 11，第 798 号，第 50 页 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北洋大臣来电。

② 〔韩〕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实录》卷 10，第 5b—6 页 a，太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③ 〔韩〕 国史编纂委员会 《敕使誊录》 卷 4，第 231—232 页，显宗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④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 11，第 795 号，第 50 页 b，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北洋大臣来电。

⑤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2，第 3831 页，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戌刻寄译署交续崇两钦差。

⑥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1538 号，第 2785 页，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华韩向有旧章，不便与同往”① 为由，予以驳回，但美方仍不理会袁世凯的反对，仍以送葬为名，派出水兵，急赴汉城，且在八月二十七日为赵太妃举行国葬时，美国水兵列队在东大门外，行军礼鸣枪，向送殡队伍致敬。② 袁世凯以美兵鸣枪为借口，向朝鲜外务督办闵种默提出抗议，并请总理衙门电转中国驻美公使崔国因，向美国国务院表示强烈抗议。崔国因虽透过美籍律师，向国务院交涉，希望能制止赫兑派兵送葬的举动。③ 但美籍律师竟以为“中国可以不问，问亦无益。美国断不因中国一言，而肯失礼于有约之国”，④ 使崔国因甚为担忧，担心美国将插手朝鲜事务，势必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再从美国国务院及美籍律师的言论，崔国因也发现欧美人士根据西方“国际法”，主张朝鲜乃一独立自主之国，不承认也不理解宗藩体制的基础——名分秩序论，竟以为宗藩体制只不过是中朝两国礼仪往来的旧例，毫无实质上的影响力。

> 律师自谓昧于亚洲大国属国名义，就欧美洲学人所论，韩之于中，即昔之那不勒斯屏藩罗马之类，于公法不能因进贡屏藩，遂谓非自立自主之国，与美合众各国不得与他国自行议约者迥异。中许韩议约通使，皆赞之，谓合公法。其后每以韩自主之事，阻遏他国，事近越俎，颇中公法所忌，亦适足迫之，疏其上国而亲他国。在中韩交际，原非他国所得过问，但遇一二事牵及他国，断不能舍公法而旁求亚洲一二国之旧例，未见其于中华有益。其见解大抵如此，故所论卒不合。⑤

崔国因担心西洋各国皆以“国际法”为标准，不愿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朝鲜的归属争议才会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龃龉。长久下去，依仗着欧美各国的势力，朝鲜可能假借“国际法”为由，逐步废除事大礼仪，再以朝鲜政教自主为由，一举脱离中朝宗藩体制，对外宣称朝鲜乃自立自主之国，与中国毫无瓜葛。中韩宗藩体制虽不被欧美各国所接受，袁世凯却利用赐奠赵太妃的机会，再次遣使派兵，向朝鲜证明清政府的实力，也向欧美各国强调了清政府与朝鲜间的宗藩关系，暂时让朝鲜自主的情势稍稍沈寂。

> 自钦使去后，各国人均谓韩的系华属，王甚病之。李仙得谋改三端，首节以欧洲使速行，冀可掩补。又闻李近以王命，驱德尼早去，以其室待授美人葛累好士，德甚恨，谓回美后，必劝美廷，以华属待韩，改派领事来驻云。⑥

美国驻朝公使赫兑见到朝鲜国王亲自出迎敕使，只能承认清政府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不禁感叹说“朝鲜对中国实怀有宗教性的敬意”，⑦ 无法再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而原本深受朝鲜国王信任的德尼，也因朝鲜国王不敢得罪清政府与李仙得的暗中排挤，不得不返回美国，不再推动朝鲜的自主运动，也使朝鲜的事大派士气大振，逐渐掌握朝鲜政府的实权。

对此，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 – 1911）给英国友人金登干（James

---

①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第760号，第42页b，光绪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北洋大臣来电；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9页，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戌刻寄译署。

② 中研院近史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70号，第2836页，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三日附件一使美大臣崔国因致北洋大臣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29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酉刻寄译署。

③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4，黄山书社，1988年，第160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第160—161页，八月二十六日；第161页，八月二十八日；第163页，九月初三日。

④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4，第161页，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⑤ 中研院近史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70号，第2838页，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三日附件一使美大臣崔国因致北洋大臣函。

⑥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2，第3831—3832页，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戌刻寄译署。

⑦ Nelson Melvin Frederick，*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Louisiana：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1946，pp. 200—202.

Duncan Campbell，1833－1907）的电文里，详细说明了迎敕事件的始末及其影响。赫德认为，朝鲜国王接待敕使的方式，将决定中朝宗藩关系是否走向实体化，而朝鲜国王向皇帝诏书行“跪拜礼”的举动，让外国公使们明白宗藩体制的有效性，中朝两国之间不只是礼仪上的客套表现，确实有其控制力，清政府能透过名分秩序去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

大家都很注意朝鲜国王怎么接见这两位钦差。美国人和主张朝鲜独立的那一派人，力劝国王不接待这两位钦差，或即使接见时，也不行跪拜礼或其他足以表示中国宗主身分和朝鲜藩属地位的仪式。如果国王听了这些人的话，就不免迫使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策。如果他不听从，并且公开表示他的藩属身分（因为跪拜仪式必须公开举行），就可以迫使这些人打消想要证明朝鲜是独立国的企图。①

高丽国王11月8日在奉到宗主国中国皇帝给他的弔唁信，迎接派来的钦差大臣时，当众遵行了惯常附属国的仪式和礼节。② 可以说，朝鲜国王的行礼如仪，等于表示宗藩体制将继续维持下去，也等于向欧美各国宣示朝鲜是中国“属国”。宗藩体制正是透过宗藩礼仪展现的不对等位阶，彰显中国皇帝与属藩国王的君臣关系，也显示中国与属藩的权力分配与责任义务，并非如美籍顾问德尼在《清韩论》（*China and Korea*）所称：朝贡只是礼貌性的关系。③

五、结语

以赵太妃之薨为契机，中朝两国分别在“告讣”“赐奠”“郊迎礼”“大丧礼”四种事大礼仪上产生了礼仪之争。究其原因，实涉及到中朝两国对宗藩体制的自主争议、名分秩序及外交角力。清政府与朝鲜一开始在处理赵太妃丧礼的动机就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了压制朝鲜的自主运动，清政府欲根据“名分秩序论”，从礼仪仪式上去强调君臣名分，强化宗主权，彰明宗藩体制。而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欲重导朝鲜的权力分配，扶持事大派的实力，并藉由事大礼仪的举行，向欧美各国表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与等差位阶，打消朝鲜君臣追求独立的念头。另一方面，朝鲜欲低调处理赵太妃的丧礼，不愿派出“告讣使”，也设法回避“郊迎礼”的举行，不想国王出城郊迎敕使队伍，更不想为赵太妃举行“大丧礼”，担心朝鲜君臣只要向皇帝诏书行三跪九叩礼，等于承认了朝鲜是中国属藩，将严重打击朝鲜的自主运动。

朝鲜国王李熙游移在“事大”与“自主”之间，对迎敕仪式多有反复，可见其内心之焦虑。后来，朝鲜国王虽按惯例，履行“郊迎礼”，向敕使鞠躬四拜，也顺利举行“赐奠”，但从王世子迎敕与敕使赐祭的过程及其仪式差异上，充满了中朝两国互相较劲的味道，可见朝鲜政府仍保有其自主意志，巧妙地掩饰了君臣之分的等差位阶。对朝鲜君臣的小动作，袁世凯强力干预招待敕使之事，在仪式上毫不退让，特意让敕使队伍行经仁川的华洋租界，甚至以护送敕使为名，派兵拆屋扩路，高调宣传敕使的到来。可以说，袁世凯利用赐奠赵太妃的机会，让清政府再次遣使派兵，向朝鲜展现中国的实力，明确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也让各国驻朝公使承认清政府的宗主权，无法再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却使朝鲜君臣颜面扫地，反华意识大涨，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主要参考文献

[1]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总号1888，第280页，赫致金第466号1890年11月2日发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8册，总号1905，第679页，赫致金第435号1890年11月11日发电、12日收电。

③ ［日］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韩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第235、256—258页。

[2] 曹雯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3] 宋惠娟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林明德 《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 年。
[5] 伊原泽周 《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6] 宋炳基 《一八八二年朝美条约的订立与清代中国》，台北：乐学出版社，2006 年。
[7] 权赫秀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 年 10 月—1885 年 10 月）》，《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6 年第 1 期。
[8] 岡本隆司 《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
[9] 权赫秀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4 期。
[10] 权赫秀 《两截体制与 19 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以首任天津驻扎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活动为中心》，韩国《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2007 年 6 月第 51 辑。
[11] 张啟雄 《国際秩序原理の葛籐—中韓宗藩關係をめぐる袁世凱の名分秩序觀》，山室信一编《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 年。
[12] 坂野正高 《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 年。
[13]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高宗纯宗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1 年。
[14] 郑乔 《大韩季年史》，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 年。
[15] 李萱根 《韩国近代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会，1967 年。
[16] 周家禄 《奥簃朝鲜三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
[17]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年。
[18] 中研院近史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2 年。
[19] 袁世凯 《使韩纪略》（未刊稿），收入 *Great Britain*，*F. O.* 228/1091 NO. 1072（1892）。
[20]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
[21] 朴容大 《增补文献备考》，汉城：古典刋行会出版，1958 年。
[22]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敕使誊录》，《各司誊录》第 90 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97 年。
[23] 高秉云 《近代朝鲜租界史の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1987 年。
[25]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 年。
[26] 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 《日省录（高宗篇）》，首尔：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1972—1974 年。
[27] 篠原啟方 《朝鲜王朝の茶礼—明・清使への賓礼を中心に—》，《周縁のシリーズ1：東アジア茶飲文化と茶業》2011 年 3 月第 1 期。
[28] 国葬都监编 《神贞王后国葬都监仪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档号 305—82。
[30] 崔国因 《出使美日秘日记》，合肥：黄山书社，1988 年。
[33] Nelson Melvin Frederick，*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Louisiana：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1946.

The Qing Government' s Maintenance of Suzerainty over Korea through Great Consort Zhao' s Death Issue

YOU Shu-Jun（Department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0011142@zju.edu.cn）
On June 4，1890，Great Consort Zhao of Korea died. As a vassal state，Korea must report this issue to the Qing government，and the Suzerain，the Qing government would send envoys to Korea to bestow and condole. The king and some ministers of Korea tried to change the well-established greeting route and rites，which implied they want to acquire independence. This intention was stifl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which made the ambassadors to Korea to understand the Qing government' s Suzerainty over Korea. Korea felt humiliated and this eventually became one of the stimulating factors to the Korea´s fights for its independence.